

2009 年度臺灣產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林玉茹*

一、前言

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輯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9 年度》，¹ 2009 年臺灣經濟史相關研究共 143 篇（本），研究課題大概包括：臺灣總體或個別地區的經濟發展、經濟政策和建設、交通和郵政、土地拓墾和區域開發、移民和遷移、熟番地權或番租、都市與聚落、水利、產業、貿易以及人口變遷等。其中，如同近幾年來經濟史研究的發展趨勢，產業史數量仍拔得頭籌，較能獨立討論。² 本文即以臺灣本地的產業史研究成果為討論對象，評述 2009 年的研究重點和趨勢，並提出整體的反省和展望。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9 年度》收錄的產業史相關專書共 5 本，³ 期刊或專書論文共 25 篇；學位論文則有 16 篇，共 46 篇（本）。然而，專書中，除了鍾書豪的《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一書為碩士學位論文出版之外，⁴ 其他幾本，包括戴寶村的《世界第一的臺灣樟腦》、⁵ 李為楨和張怡敏的《殖產興業·臺灣土銀》、⁶ 黃俊夫的《硫金歲月：高雄硫酸銨股份有限公司》，⁷ 吳連賞等編的《紅毛港遷村實錄「產業篇」》等，⁸ 大多是博物館、檔案局等單位委託，屬於圖文並茂的通俗刊物，或是著重於檔案和採集史料之呈現，雖有其參考價值，但較難歸入學術專書範疇來評論。這也顯現臺灣產業史的專書，仍相當有限。

本文評介的對象以具有嚴謹的學術論文書寫，且值得說明其學術貢獻者為限。部分學位論文，由於至今仍未取得全文，僅能大概介紹其論旨，無法進一步評介。其次，由於分類常有其限制和困難，本文因以產業史為研究對象，所以依照產業分類來分節，另一方面則可以凸顯目前產業史研究之偏重，並呈現未來可以進一步開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2009 年度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² 2007 年度、2008 年度經濟史研究的整體成果和趨勢，參見：林玉茹，〈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28：4（2009 年 11 月），頁 17-21；林玉茹，〈2008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企業史、產業史及總論〉，發表於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8 年臺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2009 年 12 月，12 頁。

³ 這個數據是扣除掉《2009 年度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一書中所收沒有做學術註釋的專書而得，如鄭自隆編著，《廣告代理五十年（1958-2008）：東方廣告公司與臺灣廣告產業》（臺北：遠流，2009）；彭光治，《台股風雲起：走過半世紀的臺灣證券市場》（臺北：早安財經，2009）；秦賢次、吳瑞松，《臺灣保險史綱 1836-2007》（臺北：保險事務發展中心，2009）。上述這些書，缺乏完整的學術論證和引據，較適合歸入史料作參考。

⁴ 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9。

⁵ 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⁶ 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⁷ 臺北：檔案管理局，2009。

⁸ 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9。

發的領域或課題。現代國家的政府部門通常將產業結構劃分成一級產業、二級產業以及三級產業等三大類型。以下即由各級產業來說明 2009 年度臺灣產業史的研究成果。

二、一級產業史研究

一級產業通常泛指農業部門，包括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2009 年度仍以農業史研究最多；林業史研究近年來興起，數量居次。漁業和畜牧業則僅各一篇，仍是相當值得開發的課題，特別是臺灣畜牧業史的研究至今仍大半空白。以時間斷代來看，一級產業史研究較偏重於日治時期，早期和清代掛零，亟待推動。

農業史研究偏重於日治時期，尤以稻作技術的改良和發展最受到矚目。蔡承豪的博士論文〈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⁹ 是第一篇從實時性角度，探討史前時代至 1950 年代臺灣稻作的品種、技術以及經營的專文。亦即重建臺灣稻作如何由野生、粗放、一年一穫，朝向品種增加和改良、精耕細作、一年兩穫以及科學化之經營。該文指出 18 世紀中葉，在外銷市場的需求下，臺灣稻作經營逐漸走向一年二穫，栽培法多元化，同時漢人長期與土地互動，不但發展出在地農業知識，且建立一套具在地特色的在來農法體系。日治時期的改革，則集中於栽培技術和品種限定，並透過農事、行政以及警察體系的動員，強制鑲入在來農法中。蔡文耙梳眾多史料，並與日本本地農法和農業政策比較，釐清日本殖民政府如何改良臺灣的稻作技術，為其貢獻。然而，全文篇幅略嫌過大，部分說明稍有繁冗、瑣碎之嫌，如能善加剪裁、多加分析和解釋，當更具可讀性。之後，他也陸續修改其博士論文，分篇發表。〈從在來犁到改良犁：臺灣的犁具改良（1900s-1960s）〉一文，¹⁰ 詳細地介紹臺灣犁具如何由在來犁逐漸為日治時期研發出的改良犁超越的過程。該文指出荷蘭時代引入重量輕而較易操作的在來犁，然而缺點是不易深耕、容易損壞。日治時期為了提升農業生產力，一開始嘗試引進西洋犁，但不成功，1920 年代才逐漸由農事單位研發出改良犁，而逐漸推廣到臺灣各地，戰後改良犁更取代在來犁之地位。本文清楚而詳細地介紹臺灣各地各種犁具的特性，可視為臺灣犁具的小百科。〈「軍刀農政」下的臺灣稻作技術改革與地方因應〉，¹¹ 則討論日本殖民政府如何自 1905 年以後才陸續將在本土施行成功的鹽水選、共同秧田、正條密植、除草和驅蟲等措施引進臺灣，並檢討其實行成效。殖民政府如何引進其科學化的農業技術並非是新課題，不過本文卻特別著重於過去較忽略的被殖民者農民端的反映，並反映出一個值得進一步反省的課題，亦即殖民治理的有效性問題。該文指出日治前期臺灣的稻作改革仍延續日本本土「軍刀農政」策略，但是殖民政府的政策並非可以完全落實，而受到固守原來地方傳統知識的農民的抗衡，以致於共同秧田和正條密植實施成效不彰。此外，過去討論土地拓墾大多從開發史角度著手，而較少注意農作物及其經

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¹⁰ 《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 年 3 月），頁 161-214。

¹¹ 《臺灣學研究》，8（2009 年 12 月），頁 83-118。

營技術在拓墾史中的位置，蔡氏的〈高屏地區在來稻作時期稻米品種變遷之研究（17世紀初-20世紀初）〉，¹² 則以稻米品種的變化為觀察焦點，分成四階段，說明 17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高屏地區的拓墾和稻作技術變遷之關係。該文指出在 18 世紀前期以前，拓墾中心在高雄平原，受限於該地雨水集中於夏季及水利設施不足，水田經營受到限制，且以晚稻品種和生產居多。18 世紀中期以後，屏東平原開發，尤其是客籍移民積極經營稻作，水利逐漸完備，早稻品種大量增加，得以建立一年二作的水稻經營系統，並對外輸出。至 20 世紀，稻作經過長期的經營，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品種。不過，受限於高屏地區的自然條件，該地的旱田仍高於水田，晚稻亦多於早稻。

在殖民主義時期稻作品種改良方面，眾所周知，農業技術專家磯永吉功不可沒，但是有關其在戰後臺灣農業的表現，則少有人論及。歐素瑛，〈從鬼稻到蓬萊米：磯永吉與臺灣稻作學的發展〉，¹³ 主要從學術史角度，以磯永吉為核心說明其與臺灣稻作改良和發展之關係。該文提及戰後在磯永吉的努力之下，將臺灣稻作的育種成果向海外輸出，擴及東南亞、南美洲，協助其他國家脫離糧食缺乏危機，對世界農業的復興助益甚大。磯永吉與日治時期臺灣蓬萊米的發展，雖不是新問題，但本文呈現過去較少關注的戰後臺灣農業與世界農業連動的另一面向。

本年度除了稻作農業之外，也開闢出一些新課題，包括香花產業、水果產業及蓖麻業之研究。首先，香花產業與臺灣北部包種茶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卻很少受到重視。李進億，〈萬頃花田萬斛珠：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史初探（1895-1945）〉，¹⁴ 重建日治時期以大稻埕為中心周邊香花栽培地的分佈、生產和運銷，以及隨著無花香包種茶技術發明之後，香花產業逐漸沒落之經過。李文大抵描述了日治時期香花產業的興衰過程，然稍微過度偏重香花價格高低之分析，而似乎較未掌握長期而結構性的因素。曾立維，〈延遲的商品化：日治前期臺灣水果產業出現之契機〉，¹⁵ 以水果產業的商業化為焦點，認為日治初期由於日本水果市場的開發、陸路交通改善、都市人口增加以及新技術引入，使鳳梨、柑橘、香蕉等水果業得以進入商品化，栽培、生產地點及島外貿易迅速擴展。不過，該文為了強調日治時期才是臺灣水果產業外銷展開時期，並未先完整地利用清代中、西文材料，來重建清末臺灣龍眼出口貿易的實況，不但對於臺灣龍眼品質評價值得商榷，且仍有低估清末臺灣水果商品化之嫌。曾令毅，〈植「油」報國：蓖麻栽培與戰時臺灣社會〉，¹⁶ 敘述 1934 年，為了減少外匯支出，總督府實行特種作物獎勵栽培政策，是蓖麻栽培由試驗期轉到實行期的關鍵。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由於蓖麻油作為飛機潤滑油的軍需作物，殖民政府更積極地透過愛國蓖麻運動、皇民奉公會，甚至是學校教育的推行，以達到

¹² 收入簡文敏編，《2009 南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高雄：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2009，頁 145-164。

¹³ 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239-270。

¹⁴ 《臺灣文獻》，60：1（2009 年 3 月），頁 267-310。

¹⁵ 《臺灣風物》，59：4（2009 年 12 月），頁 63-104。

¹⁶ 《臺灣史學雜誌》，7（2009 年 12 月），頁 85-114。

增產蓖麻之目的。該文特別關注戰時軍需作物增產與社會動員之關係，值得肯定，未來如能與日本本土、朝鮮、滿州進行比較，當更能瞭解戰時臺灣軍需作物增產在日本帝國和殖民統治的位置和特殊性。

此外，除了描述各項農業生產、技術的變遷外，本年度農業得以發展的外部因素也受到注意，包括氣象系統或政府試驗事業與農業之關係，是較新的研究取徑。李力庸，〈日治時期臺灣產業氣象系統之建立與農業運用〉，¹⁷ 特別從氣象與農業發展的角度，重建日時期臺灣的產業氣象測候網，並以米、糖為例分析農業氣象系統的設計和效果，以及民間氣象知識的傳播。該文指出除了官設測候所之外，臺灣氣象測候網還包括農會、警察駐在所、製糖會社等等官方和民間的協力觀測單位。總督府也利用測量資料進行米、糖生產的研發，而在品種改良上有突破性發展。不過，測候所技術人員的培育和氣象研究仍集中於日本人；氣象知識則透過雜誌和農民曆傳播給農民。本文開闢了一個新議題，也提出有意義的論點，但是部分討論仍可以進一步釐清，例如氣象系統的建立究竟與理蕃有何關連，需要更縝密的論述。張靜宜的〈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之試驗事業：以麻系作物為例〉，¹⁸ 則著重於總督府農業試驗所的試驗事業對黃麻、苧麻等麻系作物發展的影響，提供了日治時期這些麻系作物由試驗到標準化栽植、增產，及向南洋移植的概況。不過，此課題在張氏的專書中早已論及，¹⁹ 本文卻隻字未提，未能顯現其個人學術研究的積累或新突破，稍嫌可惜；又如能盡量採用長時期而非僅一年的資料以展現麻系作物的動態變遷，將更具意義。

戰後農業的研究，僅有兩篇學位論文可以參考，一是討論地區性農業利用；另一是針對退輔會農場的個案研究。王婉婷，〈戰後臺南縣東山鄉的農業土地利用與變遷〉，²⁰ 以東山鄉為例，分別討論丘陵區和平原區的土地利用和變遷，及影響農民選擇作物的因素。該文指出平原地區由於受到來自白河水庫或是嘉南大圳灌溉供水不同的影響，呈現前者為單期作，後者為兩期稻作的農業差異。丘陵地區則有淺山地區多龍眼和柳橙，內山地區多種植龍眼、椪柑以及咖啡現象。本文大抵還原戰後東山鄉的土地利用現象，但是該地農業經營是否具有獨特性，則是未來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課題。另一方面，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帶來六十多萬軍人，為了安置他們，特別設置行政院退除役官民輔導委員會（退輔會）。退輔會參與的事業相當龐雜，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超大集團，相當受到矚目。過去的研究大多重視其行政與制度、族群關係與認同、轄下事業的經營以及機構內榮民的生活和問題等面向。退輔會所管理的眾多農場，卻是近年來新興的課題。²¹ 黃筱瑩的〈輔兵屯墾：花蓮農場事業

¹⁷ 收入侯坤宏、林蘭芳編，《社會經濟史的傳承與創新：王樹槐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稻鄉，2009，頁133-176。

¹⁸ 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185-214。

¹⁹ 張靜宜，《戰時體制下臺灣特用作物增產政策之研究（1934-1944）》，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7。

²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9。

²¹ 如李紀平，〈「寓兵於農」的東部退輔老兵：一個屯墾的歷史現場〉，花蓮：東華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黃柏松，〈退輔會榮民安置與梨山地區的農業發展〉，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范

的歷史考察（1952-2006）一文，即以花蓮農場為例，說明政府如何讓退伍軍人參與中部橫貫公路的開發，以達到交通、山地開發以及安置榮民的三贏策略。中橫公路興建之後，又讓退伍軍人參與防洪工程、支援東部開發，而成立開發總隊。上述兩項工程結束之後，這些退伍軍人被安置於花蓮等農場。由於國家政策和退輔會機制使然，農場中的場員與地方社會頗為疏離，更是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半封閉性地存在於社會中。²² 大體上，本文運用經濟部檔案等一手史料，同時透過田野訪問補文獻不足，提出花蓮農場的個案研究成果，但若能與前人研究進行對話，當更能凸顯其價值。

攸關農業發展和農民組織的農會續有新論。林寶安，〈農會改進：戰後初期臺灣農會體制的建構〉，指出戰後國民黨政府由於中國大陸失敗的經驗，在臺灣除了施行土地改革之外，同時進行農會改革，試圖排除地主階層的勢力，並由農民新貴參與農會組織，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忠誠支持者，農會的威權侍從體系因之成立。地主菁英階層也因喪失了原來在鄉村地區的最主要組織性資源農會的支撐，無法再藉由籌組合作社或其他團體來發展和凝聚地方力量，甚至從鄉村轉往都市、轉向非農業部門發展。農會改革可以說是農村地主勢力的淨化運動，成功地防堵地主勢力的重新集結，則是土地改革得以成功的關鍵。²³ 過去較少討論農會改組對於地方士紳和地主階層的衝擊，本文則針對戰後農會權力結構的變化與土地改革、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形構，做了相當好的連結和解釋，值得肯定。惟本文結論又含混提到分家後地主階層仍保有彈性因應空間與機會，不但沒有具體論述，且與其論點略有相左，則尚待進一步釐清。

戰後漁業史研究也是較新的研究取向。林志德，〈嘉義縣沿海牡蠣養殖與社會的變遷〉，²⁴ 以嘉義東石鄉牡蠣養殖為研究對象，分別探討牡蠣養殖的水陸環境變遷、生產技術變遷以及社會變遷。林文敘述了荷蘭時代至今牡蠣養殖技術變遷及其原因，亦即從早期的散佈式養殖，至 1960 年代的筒棚式，及 1980 年代的浮棚式養蚵；並認為臺灣牡蠣養殖逐漸由沿岸淺水灘朝向較深水域發展，養殖戶所要投入的技術、材料以及設備也越來越複雜。該文對於牡蠣產銷通路的變化、養殖戶的老年化、東石帶殼牡蠣加工業的興起以及如何改善養蚵品質等，均有詳細分析，是一篇相當紮實的碩士論文，提供了兼具實證和應用的觀察和論點。蔡昇璋，〈美援與戰後臺灣漁業技術發展之研究〉，²⁵ 概說日治至戰後漁業發展概況。該文對於前人研究成果掌握和評述不差，但是結構和史料運用稍嫌薄弱，且如能扣緊美援與臺灣漁業這個主題來論證，加強分析和解釋，當更有斬獲。

本年度首度出現研究戰後畜牧業的專文。劉志偉，〈國際農糧體制與臺灣的糧食

郁文，〈榮民成為農民：退輔會農場的歷史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0（2008 年 6 月），頁 127-168。

²²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9。

²³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1（2009 年 3 月），頁 143-188。

²⁴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²⁵ 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北：稻鄉，2009，頁 321-382。

依賴：戰後臺灣養豬業的歷史考察〉，²⁶ 從 1970 年代以來臺灣產生糧食依賴的現象出發，試圖解釋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其指出戰後美國為了解決農產品過剩問題，積極拓展海外市場，鼓勵臺灣發展畜牧業。國民黨政府則一方面接受美式的現代化飲食概念，主張增加蛋白質攝取，進而促使臺灣的養豬業由原來的農家副業轉向專業化發展；另一方面，配合美援玉米的進入，推廣以玉米為基礎的養豬業。玉米的進口量遽增，則使臺灣成為高度糧食依賴的國家。戰後臺灣現代化養豬業的建立過程，遂隱含著在美國主導的國際農糧體制運作下，臺灣被整編到以美國飼料穀物為基礎的產銷環節中。本文問題意識清楚，從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來看臺灣畜牧業和糧食依賴的關係，有其新意。此外，陳美至，〈戰後臺灣米糖政策之政經分析，1949-1980〉，²⁷ 則分階段探討戰後政府如何透過米糖政策的操作來穩定政經秩序，促進工業發展。

三、二級產業史研究

二級產業是指工業部門，包括加工業、製造業、礦業、水電、煤氣及建築營造業等。其中，除了煤氣、營造業的研究至今仍相當缺乏外，製造業、礦業以及水電業大抵有些討論，且著有成果。

首先，在跨政權工業成長和特質的分析，有葉淑貞的〈臺灣近百年來工業成長型態之剖析〉一文。²⁸ 其用翔實的統計數字，從長時期觀察日治時期至戰後臺灣工業成長的趨勢、型態以及差異，並與日本相比，以凸顯臺灣工業成長的特色。該文指出日治時期由於長期偏向糖業單一產業的發展，因此不但產業結構變動緩慢，且因以食品加工業為重心，工業成長型態更加不穩定。戰後則朝向紡織、化學以及電機電子等數類工業鼎立發展型態，成長相較之下高度穩定，且結構變動迅速，並能於 1953 年迅速恢復戰前最高產值。

日治時期的鴉片漸禁政策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但是卻少有人注意總督府官製鴉片如何產生。許宏彬，〈剖析阿片：在地滋味、科技實作與日治初期臺灣阿片專賣〉，²⁹ 有別過去較重視鴉片漸禁政策制度或醫療衛生的研究取向，而另闢蹊徑，專注於總督府為了實施鴉片專賣政策，讓臺人購買官製鴉片，如何委由製藥所來研發出適合在地人口味的鴉片的過程。誠如作者指出，官製鴉片的運作，代表的是總督府經由調查、取樣、科學化的實驗，逐漸掌握臺灣人的鴉片品味和知識，同時透過科學化、機械化的生產，加以警察系統的配合，使得官製鴉片終為臺人接受；科學化的鴉片製造工廠也在殖民統治初期扮演儀式展演的角色。本文已經清楚地重建日治初期官製鴉片技術和知識的產生過程，並剖析背後所涉及的殖民統治知識與權力之操作。

²⁶ 《臺灣史研究》，16：2（2009 年 6 月），頁 105-160。

²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²⁸ 《臺灣銀行季刊》，60：2（2009 年 6 月），頁 304-339。

²⁹ 《科技、醫療與社會》，8（2009 年 4 月），頁 72-120。

不過，本文認為日治初期為了解決財政窘境，而試圖經營一個工業化的殖民地，亦即將鴉片生產直接等同工業化，似乎忽略了眾多研究所指出殖民前期「農業臺灣」的定論。另一方面，該文對於前人有關鴉片漸進政策研究成果之掌握，仍待補充。

過去糖業的研究成果眾多，卻較少直接討論糖廠的運營。鍾書豪的《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一書，³⁰ 分成六章，以花蓮糖廠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從貫時性角度敘述花蓮糖業的發展，並試圖提出分期；另一方面，從糖廠的經營和運作說明日治至戰後花蓮糖廠的演變。該書指出過去對於官營移民成效雖然多有保留，但是其緩和了鹽糖勞力的供給卻是不爭的事實；本書也從區位、原料供給等面向，敘述大和工場比更早建立的壽工場發展更好甚至取代其地位的過程。本書挖掘一手的糖廠史料，而提出不少有意義的新論點，然沒有與過去糖業研究成果好好對話，而較無法進一步凸顯其貢獻，稍嫌可惜。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日治時期資料來概說清代，常有過度貶抑清代傳統糖業的問題。特別是認為清廷不鼓勵糖業發展或是清中葉花蓮製糖業已經發展的說法，頗值得商榷。又將稻米視作維生作物，忽略其自清代至日治時期作為出口商品的特質；該書對日治時期米糖相剋現象的說明也有些誤解。

日治至戰後工礦業的傳承和斷裂問題，近年來成為重要的課題。洪紹洋近幾年即特別著力於日治至戰後臺灣機械、造船產業的發展和傳承問題。〈日治時期臺灣機械業的建立與發展：以臺灣鐵工所為例〉，³¹ 以臺灣最大的機械業臺灣鐵工所為例，透過其成立、組織、廠房設備、資產分析及經營實績等來呈現臺灣機械業的生成過程及轉變。該文指出臺灣機械業的出現來自於新式製糖廠的需要，其營運成長完全配合糖廠的生產週期；也因為糖業的迫切需求，甚至成功研發出的滾軋早於日本本土，不過由於沒有金屬和鋼鐵等上游產業，顯現出臺灣工業發展的跛行性。1930年代，配合軍需工業之發展，臺灣鐵工所不但擴充廠房，朝向多角化經營，不再僅提供糖業所需機械，而且商品更配合日本南進政策，進一步運銷到廣東和菲律賓，展現了戰時臺灣機械業的新特質。本文利用了臺灣鐵工所的一手史料，清楚地釐清殖民地機械業與製糖業發展之間的密切關連，以及因應戰時新體制下產業的整體變化，有其貢獻。不過，或許受限於資料，本文對於戰時臺灣鐵工業與軍需工業發展之間的討論稍微薄弱，其相對於日本本土鐵工業的營運是否具有獨特性，尚須進一步釐清。自2007年以來，洪紹洋也致力於日治至戰後臺灣造船業的發展，陸續發表了不少論文。³² 本年度新作，〈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移轉：以臺灣造船公司為

³⁰ 該書詳細的內容介紹，參見：洪紹洋，〈書評：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東臺灣研究》15（2010年7月），頁121-126。

³¹ 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271-296。

³² 洪紹洋，〈戰後初期臺灣造船公司的接收與經營（1945-1950）〉，《臺灣史研究》14:3（2007年9月），頁137-174；〈開發途上國工業化之條件：1960年代之臺灣造船公司における技術移轉の例〉，《社會システム研究》15（2007年9月），頁87-108；〈戰後臺灣造船公司的技術學習與養成〉，《海洋文化學刊》4（2008年6月），頁153-194；〈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學習和養成：以臺灣造船公司為個案分析（1948-1977）〉，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博士論文，2008。

個案分析)，³³ 可以說是集大成。其以戰後臺灣造船公司的經營為例，檢討發展經濟理論、依賴理論、新古典經濟學以及 Amsden 等有關戰後後進國家工業發展的各種論述的適用性。該文認為由於造船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政府卻缺乏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來協助臺船取得更多訂單。另一方面，從臺船的自製率來看，其發展僅是藉由低廉的勞動成本進行代工，技術尚未脫離對日本的依賴。亦即以臺船的例子，該文指出 Amsden 提出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發展政策，最能解釋臺灣造船業的發展與否。本文問題意識清楚，加以作者能夠廣羅各種一手未刊的檔案，條理清晰地重建戰後臺灣造船公司技術的演進與經營問題，並進一步反省國家與工業化發展的關係，值得肯定。

陳慈玉近年來特別重視軍需工業的研究，並逐漸延伸至戰後，本年度特別著重於探討戰前至戰後臺灣軍需工業或工礦業經營的連續與斷裂問題。³⁴ 〈斷裂與連續：戰時到戰後初期臺灣重要軍需工業的變遷〉一文，以工業鹽、無水酒精、鋁、紙以及金為例，較著重於戰時日本經濟統治體制和戰時軍需工業的發展；〈連續與斷裂：戰後初期的臺灣工礦業，1945-1947〉，³⁵ 則選定碱氫工業、煉鋁業以及煤礦業為例，較著重於以資策委員會為主的工礦業接收過程以及國營、省營、國省合營配置的討論。上述兩文結論相當一致，均認為從產業的分工結構而言，日治至戰後顯現連續性；但企業組織則由民營變成公營，以及技術傳承上均呈斷裂性。

戰後二級產業史也有一些成果，除了過去研究累積頗豐富的紡織業之外，沈船打撈業和 IC 產業等新課題之發掘或是新議論，值得注意。由於紡織業在戰後臺灣工業發展上具有重要地位，一直是較被重視的課題。本年度有兩篇碩士論文持續探討紡織業的發展。彭琪庭，〈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65）〉，³⁶ 特別著眼於過去較少注意的香港僑資在臺灣紡織業發展中的角色。該文指出 1950 年代韓戰爆發後，香港華僑為了尋求安全的投資環境，轉至臺灣投資設廠，為當時缺乏資金、設備老舊的紡織業注入新血，生產規模得以擴大；其次，在政府嚴格管制貿易的時局下，香港華僑因有僑資獎勵政策得以直接進口原料，解決國內紡織業者缺乏原料問題，但也引發不少爭議和舞弊；最後透過香港僑廠也改善了臺灣染整技術、拓展了成衣外銷管道，引進國際流行潮流。莊濠濱，〈從國營到民營：戰後臺灣國營紡織業之變遷（1950-1972）〉，³⁷ 主要討論 1950 年至 1970 年之間臺灣國營紡織企業的發展及民營化過程。該文雖然不少地方語意稍嫌不夠清楚，但嘗試釐清戰後初期發展紡織業的原因、限制以及分析政府紡織業政策的得失，並試圖與劉士永、瞿宛文、石田浩等人的先行研究對話，提出新看法。在沈船打撈業方面，則有劉芳瑜，〈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闡述海軍在戰後臺灣沈船打撈業的角色和貢獻。該文

³³ 《臺灣史研究》，16：1（2009 年 3 月），頁 131-168。

³⁴ 《兩岸發展史研究》，7（2009 年 6 月），頁 145-189。

³⁵ 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65-124。

³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³⁷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9。

指出戰後海軍爲了疏浚港口、清理航道以及以沈船物資籌措建港經費，乃留用日本技術人員，號召民眾參與打撈，而促使沈船打撈業和拆船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使得戰後大撤退得以順利疏散物資和人口。劉文除敘述海軍在左營軍港、澎湖海域的實際打撈工作，並以阿波丸的打撈爲例，分析海軍在沈船打撈上扮演保護者、實際探測者的角色，又從交通、國防、經濟及技術面說明沈船業對臺灣社會之貢獻。³⁸

此外，臺灣 IC 產業在世界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有關 1970 年代臺灣爲何發展 IC 產業，早已受到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注意，研究成果頗多。蔡偉銑，〈技術官僚與產業升級：臺灣 1970 年代 IC 計畫的重新檢視〉，³⁹ 則另外從產業官僚和產業升級的角度重新審視過去的說法，比較臺灣 IC 產業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政策，以及臺灣與韓國 IC 產業發展之差異。該文認爲與其視 IC 產業爲新產業，不如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考量，因爲早在此之前，臺灣消費性電子業已經相當普遍。另一方面，他從蔣經國政府國家建構的角度指出，在技術官僚的危機意識和旅美工程師科技報國集體價值觀結合下，使得臺灣抓住全球 IC 產業擴張的契機，可以進行產業升級。有別於過去特別凸顯李國鼎等科技官僚在 IC 產業發展的關鍵性，蔡文更強調從國家建構與產業發展的關係，饒有新意，惟本文敘述太過繁冗，略嫌不夠精鍊。

四、三級產業史研究

三級產業指服務業部門，包括金融保險、不動產、交通運輸、倉儲、通訊、公共行政、工商服務、社會服務及其他等。相對於一級產業史和二級產業史研究之多，三級產業史則研究成果相當有限，上述不少領域至今乏人研究，明顯地仍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本節主要針對企業史相關研究進行說明。

日治末期臺灣出現了一個超大規模的拓殖型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不但旗下有眾多投資會社，而且參與諸多事業的經營，過去以來輩受注意，⁴⁰ 2009 年度續有新論。張素玢，〈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州拓殖公社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⁴¹ 則著重於日本帝國擴張與國策會社移民事業的關係，並從日本帝國的北進和南進政策的觀點，比較 1936 年以後先後成立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和滿州拓殖公社兩個國策會社移民事業的特性，而指出滿拓的移民事業主要配合北進政策，臺拓則配合南進政策。從比較殖民的觀點，本文極具研究意義，對於日治時期移民政策的展開也提出一個大概輪廓。惟臺拓和滿拓性質究竟有何異同關係，又如何影響到移民事業的規劃，以及兩社移民成績有何不同，應是未來可以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自 2003 年以來，趙祐志著重於在臺日人企業的人際網絡或地緣網絡課題，曾特別以彰化銀行和臺北三大商業資本閥爲例，討論「鄉土閥」的存在，以及其如何利

³⁸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³⁹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1（2009 年 3 月），頁 25-99。

⁴⁰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研究成果的回顧，參見：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第一章緒論，未刊稿。

⁴¹ 《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 年 3 月），頁 33-72。

用地緣網絡來籌措資金，招募人才，並形成透過其地緣網絡支配的企業。⁴² 本年度〈地緣網絡與在臺日人企業的經營（1895-1945）：以近江商事等十二個鄉土閩企業為例〉⁴³ 一文，則是延續性的著作，主要以臺灣的十二個企業為例，討論其運用地緣網絡的目的。本文相當細緻地重新還原各企業的基本資料，論點與前述二文大抵相似，結論部分特別提出在臺日人的認同也有所區隔，分成與日本內地聯繫的「府縣人會」和在臺灣生根的「町會」。企業史的資料向來不易取得，研究企業網絡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性，本文大概重現了各企業的基本輪廓。不過除了使用各種會社年鑑等資料之外，似乎可以考慮進一步利用報紙及其他相關材料，來討論地緣網絡如何影響企業的實際運作，而避免稍嫌流於流水帳系譜之敘述。

五、結語：反省與展望

2009 年度，產業史仍是臺灣經濟史研究的主流。本文依一般的產業結構分類，分別從一級產業、二級產業以及三級產業來檢視其研究特色和方向。結果很明顯地，本年度的產業史研究比較偏重一級產業，三級產業研究則過去至今成果偏少，是亟需開拓的領域。舉例而言，服務業部分，較重視金融保險業，但包括餐飲、服裝、鞋子、家具、醫藥業…等等產業史仍有待補白。

本年度發掘了不少新課題，令人矚目。農業史除了過去較重視的稻、蔗作產業之外，包括水果業、蓖麻業、香花產業，已有一定程度的釐清；影響農業發展的外部因素也有所斬獲。畜牧業史首度出現學術專文。工業史部分，則沈船打撈業是新議題；機械工業、IC 產業均有延續性的研究，並嘗試與過去研究成果對話，較有突破。另一方面，從技術變遷角度來看產業史的發展，也受到關注，如稻作品種和技術的長期變遷、鴉片製造等。特別是戰前至戰後，或是日治時期至民國時期跨政權下臺灣農業、工礦業的連續和斷裂，近來極受到重視，本年度也有不錯的表現。究竟如何去評價日本時代的產業發展及其戰後處境，或是進行跨政權之比較，的確是除了目前較流行的比較殖民觀點之外，可以進一步發展和辯論的課題。

再從研究斷代來分析，通論有 14 篇、早期和清代均掛零、日治時期有 14 篇、戰後時期 18 篇。顯然，產業史研究偏向戰後時期和長時期的觀察，但是以學位論文居多。如不計入學位論文，則已出版的專書或論文仍相當偏重日治時期產業史的研究，大抵上也符合近年來經濟史和產業史研究之趨勢。早期和清代產業史研究則更加趨於式微，特別是清代產業史破天荒地完全掛零，顯示其研究的斷層是未來值得重視的問題。

爲了建立臺灣史研究良好的學術傳統，對於新發表的研究成果提供一些評介，

⁴² 詳見：趙祐志，〈日治時期日人企業菁英的人際網絡——「鄉土閩」的實際運作：以彰化銀行領導階層為例〉，《重高學報》6（臺北：國立三重高中，2003），頁 125-142；〈地緣網絡與盛進商行、高進商會、菊元商行的營運〉，《臺北文獻》直字 157 期（2006 年 9 月），頁 152-184。

⁴³ 《國際文化研究》，5：1（2009 年 6 月），頁 51-98。

無非希望此學科能夠進一步成長。除了前述對個別文章的一些建議之外，2009 年度產業史的研究成果，也有些現象值得深思。首先，誠如前述，清代產業史亟待振興和鼓勵，另一方面不少從長時期觀察產業發展或是日治時期的產業史研究，常附帶一提清代時期，但往往直接以日治初期，甚至日治中、晚期材料論證清代實況。從研究方法而言，討論清治時期，卻不引用清代史料或是前人研究成果，逕用日治時期的殖民記述，有其嚴重的瑕疵。事實上，日治時期儘管號稱進入科學化、數字化的殖民統治時代，然而其調查報告或是記述，常明顯地帶有殖民者的優越感和「偏見」，鄙視清代臺灣舊慣和技術，且其記載也不必然正確，因此在使用上不能不注意。

其次，《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收錄幾篇碩士班在學學生發表的期刊論文。綜觀這些論文，雖然嘗試探討一些新課題，不過由於訓練仍不足，大半沒有問題意識，文章還是相當不成熟，其在文字、結構、論述及史料運用上，仍有改進空間，所提出來的部分論點也有可商榷之處。筆者認為在正式完成碩士論文之前，即急於發表不成熟的習作，應不值得鼓勵。這個現象的產生，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少數學校要求碩士班學生畢業之前，必須發表論文。然而，依據目前各研究所課程安排之重，這個規定可能有揠苗助長之嫌。其二是，現在臺灣史研究相關雜誌相當多，或許由於稿源有限，以致於不得不收錄碩士班學生的論文。但是這些尚未經歷碩士論文完整寫作訓練的學生作品，參差不齊，除非特別優秀，不然只是習作，即使在國外也很難被接受。其實，碩士班時代，如能好好地學習和接受訓練，完成一篇紮實而有價值的碩士論文後再逐一發表，可能還是比較適切的。

再者，很明顯地，延續近幾年趨勢，碩士論文仍幾乎是臺灣產業史研究的主力，甚至部分領域僅有碩士論文可看，戰後研究猶是如此。碩士論文大抵仍是初入學術殿堂的習作，一般很少予以討論，臺灣史研究卻由於部分課題僅有碩士論文可以參考，不得不予以評介。然而，如果一個學科學術知識的生產大半仰仗碩士論文，應該是不太合理的結構。特別是近來碩士論文品質參差不齊更加顯著，部分論文甚至連基本的論文架構都有待商榷。舉例而言，一般第一章緒論通常交待問題意識、研究回顧以及研究方法，卻有碩士論文在緒論中進行主題的論述，或是章節互相重疊、條理不夠清楚。書寫方式則有些分項過細，顯得破碎，且結論又出現新史料或是再分節討論，均略嫌不當。

最後，僅使用單一史料或是僅利用二手文獻而不直接引用史料，也是相當普遍的問題。史家的技藝，最基本的莫過於一手史料的蒐集和運用，然而近年來常出現使用單一史料論證或是單一年度史料來概觀全時期的現象。尤有可議者，大半剪貼二手研究，甚至不具學術規範的文獻，所提出的論點也有待商榷。

總之，回顧 2009 年度臺灣產業史之總體研究，不但開闢不少新議題，而且有些研究也相當有突破，而加深、加廣了臺灣產業史之成果。然而，早期和清代研究趨於停滯、史料運用以及學生習作產生的問題或反映的意義，仍有待關注。

附錄一、2009 年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產業史篇

專書				
1	李為楨、張怡敏	《殖產興業·臺灣土銀》，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通論	企業
2	吳連賞、吳寬憲、陳美儒、陳禹芳	《紅毛港遷村實錄「產業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9。	戰後	產業
3	黃俊夫	《硫金歲月：高雄硫酸銨股份有限公司》，臺北：檔案管理局，2009。	戰後	工業
4	戴寶村	《世界第一的臺灣樟腦》，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通論	農業
5	鍾書豪	《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花蓮：東臺灣研究會，2009。	通論	糖業
期刊論文				
1	江辛美	〈臺灣日治時期醬油產業的變遷〉，《臺灣博物》，28：3（2009.9），頁 52-63。	日治	工業
2	李力庸	〈日治時期臺灣產業氣象系統之建立與農業運用〉，收入侯坤宏、林蘭芳編，《社會經濟史的傳承與創新：王樹槐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稻鄉，2009，頁 133-176。	日治	農業
3	李進億	〈萬頃花田萬斛珠：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史初探（1895-1945）〉，《臺灣文獻》，60：1（2009.3），頁 267-310。	日治	農業
4	林平	〈戰後初年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1945-1947）：以臺灣廣播電臺為中心〉，《臺灣學研究》，8（2009.12），頁 119-138。	戰後	廣播業
5	林寶安	〈農會改進：戰後初期臺灣農會體制的建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1（2009.3），頁 143-188。	戰後	產業組織
6	洪紹洋	〈日治時期臺灣機械業的建立與發展：以臺灣鐵工所為例〉，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271-296。	日治	工業
7	洪紹洋	〈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轉移：以臺灣造船公司為個案分析〉，《臺灣史研究》，16：1（2009.3），頁 131-168。	戰後	工業
8	陳慈玉	〈連續與斷裂：戰後初期的臺灣工礦業，1945-1947〉，收入楊振隆編，《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61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 65-124。	戰後	工礦業
9	陳慈玉	〈斷裂與連續：戰時到戰後初期臺灣重要軍需工業的變遷〉，《兩岸發展史研究》，7（2009.6），頁 145-189。	通論	工業
10	許宏彬	〈剖析阿片：在地滋味、科技實作與日治初期臺灣阿片專賣〉，《科技、醫療與社會》，8（2009.4），頁 72-120。	日治	產業政策
11	曾立維	〈延遲的商品化：日治前期臺灣水果產業出現之契機〉，《臺灣風物》，59：4（2009.12），頁 63-104。	日治	農業
12	曾令毅	〈植「油」報國：蓖麻栽培與戰時臺灣社會〉，《臺灣史學雜誌》，7（2009.12），頁 85-114。	戰後	農業
13	張家綸	〈日治時期草屯地區的金融活動與人事分析（1895-1945）〉，《臺灣史料研究》，34（2009.12），頁。	日治	金融業
14	張素玠	〈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州拓植公社與臺灣拓植株氏會社〉，《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3），頁 33-72。	日治	企業
15	張靜宜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之試驗事業：以麻系作物為例〉，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185-214。	日治	產業政策
16	蔡承豪	〈高屏地區在來稻作時期稻米品種變遷之研究（17 世紀初-20 世紀初）〉，收入簡文敏編，《2009 南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高雄：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2009，頁 145-164。	通論	農業
17	蔡承豪	〈從在來犁到改良犁：臺灣的犁具改良（1900s-1960s）〉，《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3），頁 161-214。	通論	農業
18	蔡承豪	〈「軍刀農政」下的臺灣稻作技術改革與地方因應〉，《臺灣學研究》，8（2009.12），頁 83-118。	日治	農業
19	蔡昇璋	〈美援與戰後臺灣漁業技術發展之研究〉，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	戰後	漁業

		義、薛化元編，《跨越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北：稻鄉，2009，頁 321-382。		
20	蔡偉銑	〈技術官僚與產業升級：臺灣 1970 年代 IC 計畫的重新檢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1（2009.3），頁 25-99。	戰後	科技產業
21	葉淑貞	臺灣近百年來工業成長型態之剖析	通論	工業
22	趙祐志	〈地緣網絡與在臺日人企業的经营（1895-1945）：以近江商事等十二個鄉土閥企業為例〉，《國際文化研究》，5：1（2009.6），頁 51-98。	日治	企業
23	廖彥婷、陳國川	〈坡地災害與林業發展：以臺中縣和平鄉為例（1959-1976）〉，《臺灣文獻》，60：4（2009.12），頁 173-212。	戰後	林業
24	劉志偉	〈國際農糧體制與臺灣的糧食依賴：戰後臺灣養豬業的歷史考察〉，《臺灣史研究》，16：2（2009.6），頁 105-160。	戰後	畜牧業
25	歐素瑛	〈從鬼稻到蓬萊米：磯永吉與臺灣稻作學的發展〉，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239-270。	日治	農業
學位論文				
1	丁勁丞	〈《自立晚報》經營權更迭之政經分析：1947-2001 年〉，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報業
2	王婉婷	〈戰後臺南縣東山鄉的農業土地利用與變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9。	戰後	農業
3	李禮仁	〈賀田組及其在東臺灣的開發：日治時期私營移民之個案研究（1899-1908）〉，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日治	企業
4	林子豪	〈苗栗茶產業之發展與變遷〉，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9。	通論	茶業
5	林志德	〈嘉義縣沿海牡蠣養殖與社會的變遷〉，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通論	漁業
6	施建安	〈戰後臺灣傳統鹽業：以布袋鹽場為個案之研究（1945-2001）〉，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戰後	鹽業
7	莊濠賓	〈從國營到民營：戰後臺灣國營紡織業之變遷（1950-1972）〉，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紡織工業
8	陳虹紋	〈林園鄉漁業變遷與社會發展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通論	漁業
9	陳美至	〈戰後臺灣米糖政策之政經分析，1949-1980〉，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產業政策
10	彭琪庭	〈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6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紡織工業
11	黃筱瑩	〈輔兵屯墾：花蓮農場事業的歷史考察（1952-2006）〉，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9。	戰後	農墾
12	蔡承豪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通論	農業
13	劉有庚	〈從伐木到保育：戰後臺灣林業之發展（1945-200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林業
14	劉芳瑜	〈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打撈業
15	鄭舜哲	〈臺灣稻米產業發展歷程中的國家角色〉，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戰後	政策
16	簡義倫	〈東勢的林業發展：兼論林業文化資產之保存與利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通論	林業